

中國政治中的「全贏全輸」 思維模式

——鄒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述評

● 安衛華

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民主轉型的夭折，嚴重削弱了宏觀歷史取向的政治發展研究的影響力。正當政治發展研究陷入低迷和困境之時，1970年代後期興起的博弈論和理性選擇理論為這一研究領域注入了新的活力。



鄒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的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

在西方政治學界，1960年代興起了研究第三世界政治發展的熱潮，其中一個中心問題就是向民主

政治轉型。截至1970年代，其代表性的學術文獻主要有：李普塞特 (Seymour M. Lipset) 的《政治人：政治的社會基礎》(*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①、摩爾 (Barrington Moore, Jr.) 的《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②，以及阿爾蒙德 (Gabriel A. Almond) 和維伯 (Sidney Verba) 所著的《公民文化：五個國家的政治態度和民主制》(*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③等。這些研究都屬於宏觀歷史取向的研究，強調社會經濟的發展水平和民主政治發展的相關性。

然而，在此之後，這種宏觀歷史取向的研究受到了實踐和理論上的雙重挑戰。從實踐上看，在民主轉型的國家和地區，一方面，隨着經濟和社會發展，社會對民主政治

的需求確實會急劇增長，這印證了上述宏觀歷史研究取向的結論；但另一方面，這些國家的實踐又說明，向民主政治的轉型並非一帆風順，其中伴隨着高度的不穩定性。亨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 在《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一書中對這些轉型國家的實踐進行了理論總結：即經濟和社會發展會引起政治參與擴大，而如果舊有政治體系的政治吸納和制度化功能不強，就會導致政局混亂^④。所以，與經濟工業化伴隨的不是民主政治的出現，而常常是舊有體制的失序。最終有可能導致軍事威權主義政體的出現，使向民主政治的轉型更加困難。

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民主轉型的夭折，嚴重削弱了宏觀歷史取向的政治發展研究的影響力。正當政治發展研究陷入低迷和困境之時，1970年代後期興起的博弈論 (game theory) 和理性選擇理論 (rational choice theory) 為這一研究領域注入了新的活力。這兩種研究路徑都側重於解釋人的微觀行動對社會歷史進程的影響。具體到民主轉型上的研究而言，這種肇始於經濟學的理性主義方法強調民主轉型之所以失敗，往往不是由於宏觀社會歷史條件的制約，而是由於政治行動者主觀選擇能力與選擇策略的結果。因此，政治行動者如何選擇和選擇甚麼，就成為理解民主政治轉型的關鍵。

當然，這種研究路徑也有不足之處，比如政治行動者的選擇在很

大程度上可能不是取決於自己本身，而是取決於社會歷史文化等結構因素。因此，結合宏觀歷史分析和微觀行動分析來解釋政治事件就成為研究民主政治轉型的新取向。

一 宏觀歷史和微觀行動相結合的分析方法：剖析「天安門事件」

芝加哥大學政治系已故教授鄒讜在《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的角度看》(引用只註頁碼) 一書中嘗試結合宏觀歷史和微觀行動的方法來分析中國政治。其中，該書第九章和〈後記〉對1989年「天安門事件」的分析就是應用這種方法的典範。

鄒讜認為，「着重微觀行為的『理性選擇論』可以與宏觀的社會結構論 (structuralism) 綜合成為一個完整人類行為與社會變遷的理論。」一方面，「社會結構設定了個人和集體政治行動的機會與制約，同時也提供了一系列可被選擇的行動方案」(頁211)；另一方面，個人會對社會經濟結構產生主觀上的認識，這種認識又轉化為個人的行動選擇，而個人的行動選擇反過來又會影響和推動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遷。在新的政治系統下，開始新一輪的循環。使用上述方法，鄒讜以學生和黨內的溫和派為主體，循着兩條線索，就天安門事件何以最終演變成悲劇進行了分析，對中國的民主轉型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見。

鄒讜在《二十世紀中國政治》一書中嘗試結合宏觀歷史和微觀行動的方法來分析中國政治。他認為，「着重微觀行為的『理性選擇論』可以與宏觀的社會結構論綜合成為一個完整人類行為與社會變遷的理論。」

1978年以後，國家對社會的控制有些鬆動，民間社會的獨立性稍有增加，公民社會開始萌芽，比如出現了許多學術沙龍等。但是，執政黨的危機感絲毫沒有放鬆，政治權力結構也沒有出現大的變化，政治權力還可以隨時侵入它過去主動放棄的領域。

第一條線索是從全能主義的國家和社會關係出發，分析最底層民眾的行動，說明宏觀國家社會結構和微觀行動者的思想和作風如何促成天安門事件的發生並演變為悲劇。

從宏觀社會歷史的角度來看，中國從十九世紀中期到二十世紀後期經歷了從傳統權威主義政治系統轉型到現代全能主義政治系統的過程。1978年的改革開放標誌着中國開始出現國家和社會關係的新變化，即國家開始放鬆對社會的控制。但是，這種變化還沒有深入到影響政治權力結構的變化，同時，政治領導人的危機感還很強。因此，國家和社會關係的變化以及政治權力結構、領導人危機感的延續，宏觀上決定了天安門事件的爆發和結局。

十九世紀中後期，外族入侵，迫使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條約。由於中國政治的合法性根植於政治制度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如果政治制度不能夠給民眾帶來安居樂業，不能給知識份子帶來尊嚴的話，那麼，這個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就會逐漸流失，最終導致以皇帝—地主—官僚—儒生為統治階級的傳統國家解體。

在傳統國家滅亡後，最迫切的問題就是重建新國家，建立新的政治制度，實現國家整合。這個制度重建過程就需要相應的理論指導，但到底需要甚麼樣的理論？這首先在知識份子中引起了爭論。在民間社會的重組過程中，人們成立了協會，繼而成立了政黨，包括共產

黨。為了求得生存和勝利，這個黨最終走向了武裝鬥爭的道路，積極動員群眾，形成了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並最終取得了勝利。

然而，由於革命後的國際環境比較惡劣，社會重建任務非常沉重，共產黨時常存有很強的危機感，於是，在革命階段形成的黨領導一切和對社會進行嚴密控制的做法得到延續乃至深化，最終形成了全能主義的政治系統。在全能主義的政治系統中，一個領域只能有一個官方承認的組織系統，黨組織以及黨領導下的政府和群眾組織全面侵入和滲透到社會各個領域和人民的日常生活。

1978年黨的三中全會以後，國家對社會的控制有些鬆動，民間社會的獨立性稍有增加，公民社會開始萌芽，比如出現了許多學術沙龍等。但是，執政黨的危機感絲毫沒有放鬆，政治權力結構也沒有出現大的變化，政治權力還可以隨時侵入它過去主動放棄的領域。

所有這些就是1989年學運的宏觀歷史背景。

在鄒讜看來，1989年學運爆發，起初只是一個偶然的自發事件。但是發展到第二階段，學運目標出現調整，開始要求反腐敗，要求民主。在第三階段，學運的目標變得具體化，由反腐敗、要民主，轉向要求政府承認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高自聯）是合法的、正式的學生代表組織，要政府否定「四·二六社論」，否定學生暴亂的說法。但是政府不予承認，一方面

是由於這樣做可能會出賣固有的學生會組織，另一方面怕引起其他領域的效仿，那樣的話，國家和社會關係就會出現根本的改變。但是，出於職位和利益上的考慮，有些當政的領導人也可能願意有條件地接受學生的訴求。

隨着小道消息的流傳，學生不想無功而返，他們的情緒愈來愈激烈，學運領導權開始逐漸由激進派所把持。他們拒絕撤出天安門廣場，拒絕各界人士提出的各種和解方案，要堅守到最後。用鄒讜的話說，就是政府不能做原則上的讓步，而學生的要求恰恰是原則的改變。如此，形成了一個僵局（頁241）。

鄒讜認為，學生不能夠接受實際上政府已經把他們的組織作為談判對手並隱約地予以承認的事實，而非要逼迫政府作出公開的聲明和原則的讓步，這種非和解情緒最終使政府忍無可忍，不願再作出任何的讓步。結果，僵局在6月4日以悲劇形式打破。

造成這種結果的主要原因是：學生和政府都在政治上都過份堅持原則。一方面，學生過份堅持原則，導致政治上不能夠「見好就收」，忽視了政府實際上的讓步，以及他們實際獲得的利益；他們也不接受政府溫和派和學術界的各種勸導，迫使學運最終走向了絕不妥協的不歸路。另一方面，黨和政府也犯了類似的錯誤。它們還堅持那種全能主義的觀念，堅持以革命時代的思維來考量社會主義的國家和社會關係，認為在一個領域只能有一個官

方承認的組織，而沒有想到中國的政治制度，在原則上也可以容納在一個領域內存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組織。

依照鄒讜的猜想，如果當時政府承認高自聯的地位，滿足學生的基本要求，同時肯定原學生會的地位和功能，調整這兩個學生組織間的分工，協調它們的關係，然後採用分而治之的辦法，悲劇或許可以避免（頁242）。

鄒讜進一步分析道，這種在政治鬥爭中過份堅持原則的方式其實根源於行動者思想上的「全贏全輸」觀念（頁243）。學生在要求政府承認高自聯和撤銷「四·二六社論」上要全贏，否則寧願全輸，因為怕政府秋後算賬；而政府怕對學生再讓步，就會全輸。鄒讜指出，政府和學生的「全贏全輸」思維觀念除了有歷史傳統的因素外，更直接地是與當時政治權力結構的特性有關，即最高政治權力是單一的、不可分割的。這種結構強烈塑造着博弈雙方的觀念，使挑戰者固信自己行動的道德高尚性，使執政者堅信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它使雙方都害怕全輸，都要求全贏。這樣，結構—觀念—行動之間構成了一種互動關係，結構影響觀念，觀念影響行動，行動再加固結構，周而復始，構成了一種閉環運轉。這個閉環不打破，中國政治就永遠都跳不出歷史的周期率。

鄒讜分析天安門事件的第二條線索，是探討當時的宏觀社會結構

鄒讜指出，政府和學生的「全贏全輸」思維觀念直接地是與當時政治權力結構的特性有關，即最高政治權力是單一的、不可分割的。它使雙方都害怕全輸，都要求全贏。這樣，結構—觀念—行動之間構成了一種閉環運轉。

鄒讜指二十世紀的中國就好比已經經受了三次大手術的病人。中國目前大病初癒，正在恢復時期，再經不起革命的折騰了。所以，中國民主轉型只能走第二條路，即漸進式的、演化式的改良。

如何限制黨內主張與學運妥協的領袖的行動。這裏，他使用了一種反事實的論證方式(counterfactual argument)。從歐洲和拉美民主化的經驗來看，向民主政治轉型的可行途徑是國家統治集團中的改革派和社會運動中的溫和改革派結成聯盟，來共同戰勝統治集團內部的保守派。社會運動中的激進派雖然也是重要的社會變革力量，但他們卻具有很大的反功能，他們激烈的主張常常迫使保守派更加堅守自己的立場，甚至導致保守派和軍隊的聯盟等。因此，黨內的溫和派和學運中的溫和派結成聯盟是轉型國家(也包括中國)實現民主轉型的一個必要條件。

然而，在鄒讜看來，這個理論上可行的路線在1989年的中國卻可望不可及。一方面，學運領導權被情緒愈來愈激烈的激進份子所掌握；另一方面，由於中共同心圓式的組織原則，黨內的溫和派不經組織允許是不能夠和學運份子單獨接觸的，也不能夠獨立地代表黨組織發表言論，否則就是違反組織紀律，嚴重的就是分裂黨。當時黨內溫和派的領袖已經將這些組織原則在內心中規範化了。因此，他們既不能充分誘導學生接受和解，也不能明確告訴學生即將來臨的危險，結果只能是眼看悲劇發生也愛莫能助。鄒讜認為，如果當時的學運份子能夠理解黨內溫和派暗示性的言語和行動背後的真正政治含義，雙方建立一種不言而喻的共進退的政治策略，那麼天安門悲劇也許可以避免(頁249)。

二 中國政治的民主轉型

鄒讜的這部論著還提出了一套比較完整的關於中國民主轉型的理論。

首先，關於民主轉型的目標。鄒讜主張把中國未來的政治系統建立在傳統基礎上，既不妄自菲薄，又不盲目排外，而要兼收並蓄，建立一個既是嶄新的，又是傳統的政治系統。他認為，中國不應該以全盤西化為目標，「一個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文化政治思想系統必須是嶄新的同時它必然有傳統的根源，如果缺乏歷史的基礎，這個系統是不穩固的。」(頁263)

其次，關於民主轉型的路徑。一般而言，有兩條道路：一是革命；二是改良。鄒讜比喻道，二十世紀的中國就好比已經經受了三次大手術的病人，一次是1911年辛亥革命，一次是1927年北伐革命，再次是1949年社會主義革命；而小手術就進行過無數次了。中國目前大病初癒，正在恢復時期，再經不起革命的折騰了。所以，中國民主轉型只能走第二條路，即「漸進式的、演化式的改良，一個問題、一個問題，一點一滴的去解決」(頁244)。

鄒讜提出了兩種可能的漸進化路徑。一種是在時機成熟的時候，即國家佔據社會的空間減少到一定程度、社會改革力量和黨內的改革派力量壯大到一定程度時候，社會中的溫和改革派和黨內的溫和改革派進行聯合，與政權機構中的保守派對抗。這時，有望在勢均力敵

的情況下建立社會協商和妥協機制，避免動亂。

另一種是共產黨通過改良的方式主動領導政治轉型。首先，黨和政府要轉變在一個社會領域只能有一個官方承認的組織系統的做法，擴大社會組織參與。在鄒讜筆下，新興的組織團體只是功能分工不同，仍然要堅持共產黨的領導與管理。這樣，中共在沒有喪失領導權的基礎上，還增加了利益綜合和政治溝通的能力，增加了民眾的正常參與政治的渠道。另外，中共也應該主動領導政治結構的轉型。比如在政局穩定的情況下，認真組織實施縣以及縣以下的民主選舉，推進政治多元化，然後逐步向上推廣，建立一種「一黨獨大的多黨制度」。鄒讜強調，這種「政治制度的轉型並不等於中共喪失領導權」（頁242）。因為，即使在多黨制度下，中共仍然會是一個可以左右政治的大黨。

再次，關於民主轉型的前提。鄒讜區分了兩個前提。一個是宏觀前提，即國家和社會關係的變化最終會帶來政治性質和結構的變化，從而實現民主轉型。換言之，隨着國家對社會控制的程度減少、強度降低，政治結構轉型的可能性就會增高。鄒讜預測道：「全面危機過去了，不僅目前的國家—社會關係又要發生變化，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後，權威關係與權威系統也要發生一定的變化。」（頁256）另一個是微觀前提，即微觀行動主體放棄「全贏全輸」的思想，「採取議價、討價還價的方法，了解彼此的願望與困

難，經過深思熟慮，發現新的妥協方法，提出新的政治藍圖，找尋超越於過去舊原則的新的更高一層的原則，去實現政治再進一步的發展。」（頁232-33）

三 評價與思考

鄒讜在本書中的學術貢獻，筆者認為至少包括以下三方面：

第一，該書在研究方法上嘗試結合宏觀歷史和微觀行動來分析中國政治，實現了由結構分析 (structural analysis) 方法過渡到並發分析 (conjunctural analysis) 方法，屬於新的嘗試，並且重視人的主觀能動性在歷史進程中的作用。他強調：「人的選擇是歷史發展中有決定性的機制。」（頁243）在書的結尾，鄒讜還引用攝靈 (Thomas C. Schelling，又譯謝林) 在《衝突的戰略》(*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中的話來表明自己對宏觀歷史進程的看法，「人們最直接看到的不是必然的最後結果，而是人們對某種必然結果的期待。這個期待轉過來造成這個結果的必然性。」（頁265）他還強調領導精英間的鬥爭對政治進程的影響。這點和布萊克 (Cyril E. Black) 在《現代化的動力——一個比較史的研究》(*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 A Study in Comparative History*) 一書中的觀點不謀而合。布萊克認為，「政治現代化的中心問題，是社會從墨守傳統體制的政治領導向贊成徹底現代化的政治領導的轉化。」這些新型領導精

鄒讜在研究方法上嘗試結合宏觀歷史和微觀行動來分析中國政治，實現了由結構分析方法過渡到並發分析方法，屬於新的嘗試，並且重視人的主觀能動性在歷史進程中的作用。

在天安門事件中，政府所採取的措施必須使學生相信：(1)堅持不撤出廣場的人有最大可能遭受政府的最嚴重鎮壓；(2)對於那些退出廣場的人，政府將不予任何追究。政府如何使學生接受這兩個條件的暗示，需要一種近乎苛求的政治藝術。

英來自於觀念轉變的「傳統執政領導」或「對傳統領導不滿的人」^⑤。

第二，該書將國家和社會關係與政治權力區分開來，論述了二者之間的區別和聯繫。認為國家和社會關係的變化最終會帶來政治權力性質和結構的變化，從而實現民主轉型。

第三，該書對於如何在深化政治改革的同時堅持共產黨的領導這一課題進行了探討，提出了一些有啟發意義的想法。例如，鄒讜認為在某一社會領域，允許在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下，可以成立多個功能分工的群眾團體。這一點在中國已經部分實現了。

當然，鄒讜的有些研究方法和結論還需要進一步的探討。

首先，關於如何看待理性選擇理論和博弈論在衝突研究乃至社會科學研究中的作用的問題。筆者認為，理性選擇理論在分析天安門事件中的第一個問題，應該是「為甚麼學生們會行動？」因為，按照集體行動的邏輯，學運的收益是一種公共產品，很難排除某個個人的收益，同時行動的成本還要個人來承受，因此行動很難避免「搭便車」問題，所以理性的學生是不會行動的。但事實是，學生確實行動起來了。這些學生為甚麼會選擇在那個特定的時刻組織行動起來，確實值得研究。

一方面，誠如鄧小平所言，這是受國外大氣候（東歐劇變）和國內小氣候（經濟改革受挫、思想教育鬆懈）影響造成的；另一方面，學運這場集體行動很可能是作為群體行動的副產品出現的，是群體行動的出現節約了收集信息、動員和組織集體行動的成本。比如，學運的前期，只是學生悼念胡耀邦的個人行為，但當大家都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時候，發現很多人都具有共同的偏好，個人行動加總為群體行動，這是量變。當出現高自聯的時候，群體行動突變為集體行動，這是質變。這個機制就是所謂的「大風起於青萍之末」了。

其次，筆者認為，鄒讜關於微觀選擇的方法還可以進一步模型化。當然，博弈論在社會科學上應用的一個重要障礙就是如何確定支付博弈方的收益和成本問題。這種問題即使是當事人都有可能說不清楚，作為研究者也只能給出大致的假定，用以深入地分析選擇機制。筆者在下面給出某一時間點簡單的學生決策模型（見表1）。

假設學生在某時間點有兩種選擇方案A₁（堅持鬥爭）和A₂（決定撤退）。C₁為學生在此時間點的已付成本，C₂為學生在採取A₂而政府採取秋後算賬時所遭受的追加成本，C₃為學生採取A₁並取得成功要追加

表1 天安門事件中的學生決策模型

| | 選擇方案 | 成功X | 失敗1-X |
|------|-----------------------|---|---------------------------------------|
| 學生策略 | A ₁ : 堅持鬥爭 | (Z ₁ , C ₁ + C ₃) | (0, C ₁ + C ₄) |
| | A ₂ : 決定撤退 | (0, C ₁ + C ₂) | (Z ₂ , C ₁) |

的成本， C_4 為學生採取 A_1 但是最終失敗要額外支出的成本。 Z_1 為學生採取 A_1 並取得成功的收益， Z_2 為學生採取 A_2 而政府非但不秋後算賬，還積極和學生共同努力建立協商機制等，從而導致的學生獲益。 X 為學生採取 A_1 並取得成功的概率， Y 為學生採取 A_2 而政府不秋後算賬的概率。 V_1 為學生採取 A_1 所取得的期望收益， V_2 為學生採取 A_2 時的期望收益。現在假設我們的目標是使學生選擇 A_2 （即決定撤退），那麼一個前提就是使 $V_2 > V_1$ ，即他們決定撤退的期望收益大於他們堅持鬥爭的期望收益。

從邏輯推演可知，至少存在一個或一個以上的機會使 V_2 大於 V_1 。這也意味着，在天安門事件中，政府有可能採取措施使學生從廣場撤離，從而和平解決事端。但是政府所採取的措施必須使學生相信：

- (1) 堅持不撤出廣場的人有最大可能遭受政府的最嚴重鎮壓；
- (2) 對於那些退出廣場的人，政府將不予任何追究，甚至還會主動與學生和解。但是，我們同樣發現，(1) 和 (2) 之間本身就是具有張力的兩個條件。政府愈有可能鎮壓，就愈有可能使學生聯想到秋後算賬，也就使他們抱着不成功則成仁的態度，愈不敢退出。而假設政府無動於衷，製造了不會予以鎮壓的氛圍，那麼學生就更可能抱着被縱容的態度更加堅持自己的要求，絕不妥協。

另外，在當時的環境下，小道消息滿天飛，政府和學生之間的信息溝通很難準確地傳達與被理解。因此，政府如何使學生接受這兩個

條件的暗示，需要一種近乎苛求的政治藝術。也許真的就像布萊克在《現代化的動力》中悲觀地預言：「幾乎沒有理由相信後來的現代化國家將能夠避免暴力。」^⑥但是我們希望，通過學習和實踐，總結歷史經驗，政治行動主體可以在重複的博弈中避免悲劇的重演。另外，如果政治行動主體可以發揮創造性，求同存異，合作共贏，是可能向民主和平過渡的。看來，鄒讜強調觀念變革的重要性絕不為過。

再次，關於「全贏全輸」的觀念。如前所述，鄒讜認為中國民主轉型的最大障礙是「結構—觀念—行動之間的閉環運轉」，打破這個閉環的最重要前提是放棄「全贏全輸」的觀念。但是如何消除這種觀念，還需要進一步的探討。政治觀念具有隱藏性和偽裝性等特點，消除與否不容易察覺。政治觀念也具有君子協定的性質，信則靈，不信不靈，不容易監督實施。加上許多政治博弈屬於一次性、致命性博弈（因為輸者全輸，永無翻身之日），所以觀念變革可能在一些情況下不是一種穩定的、有效的解決政治鬥爭的方法。

更重要的可能是博弈雙方的實力比較。從這個角度來看，放棄「全贏全輸」的觀念，有兩種可能：

第一，博弈雙方勢均力敵，並且可以相互嚴重打擊甚至同歸於盡。這屬於由對方實施的保證機制，也是最有效、最穩定的解決方法，但是也最難形成，因為博弈一方會不遺餘力地削弱對手的力量，以避免其形成勢均力敵之勢。

鄒讜認為，打破「結構—觀念—行動之間的閉環運轉」的最重要前提是放棄「全贏全輸」的觀念。但是政治觀念消除與否不容易察覺，也不容易監督實施。更重要的可能是博弈雙方的實力比較。

「全贏全輸」思維不只是中國政治的特色，西方世界也不乏這種思維。但是，現代西方的政黨競爭制度、選舉制度、權力分立制度為政治鬥爭建立了一種宏觀上的妥協機制，極大地限制了微觀主體絕不妥協所可能帶來的危害。

第二，即使博弈雙方不是勢均力敵，只要有強有力的保證使雙方的承諾和協議得到履行也可以。這可能需要外部壓力，包括仲裁國、聯合國等國際社會的壓力，並且壓力要足夠大。但這屬於第三方實施，也不是一種穩定的解決辦法，因為第三方要有利益和激勵才會提供保證機制。

另外，博弈不能只是簡單地放棄「全贏全輸」的觀念，還需要養成合作的共識。合作共識至少有以下三種來源：第一，來自於歷史上雙方博弈的經驗總結，包括日常時期和危機時期的經驗；第二，來自於制度的設計，比如政治協商制度、司法獨立制度、法律保障的競爭選舉制度，都是避免「全贏全輸」的制度平台；第三，來自於精英的流通，從社會各階層中選拔政治精英，加強政治系統和公民社會的溝通和交流。簡言之，從政府的角度來講，就是要盡力維護政府信用，完善政治協商制度、社會對話制度（包括信訪、聽證和監督），以及公務員考試和錄用制度，擴大政治系統的開放、交流和透明度，提高精英間以及精英和公眾間的共識。

鄒讜曾經悲憤地指出，「全贏全輸」的思維是「中國千年歷史流毒最深、遺害最大的傳統」（頁261）。其實，「全贏全輸」思維也不只是中國政治的特色，西方世界也不乏這種思維的例子。比如美國選舉中的勝者得全票制度問題，還有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和參議員洛奇（Henry C. Lodge）之間的決不妥協的鬥爭，最終導致國際聯盟條約在美國國會中流產的事件等。其

中威爾遜的一句名言就是：「寧肯戰敗千次，也決不為不光榮的妥協而朝三暮四。」^⑦但是，現代西方的政黨競爭制度、選舉制度、權力分立制度為政治鬥爭建立了一種宏觀上的妥協機制，極大地限制了微觀主體絕不妥協所可能帶來的危害。

鄒讜用「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來展望中國民主的前景（頁203）。讓我們期望國家和社會進一步地和解，因為國家不應該是居於社會之上、與社會愈來愈脫離的力量。

註釋

① Seymour M. Lipset,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Company, 1960).

② Barrington Moore Jr.,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③ Gabriel A.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④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⑤⑥ 布萊克（Cyril E. Black）著，景躍進、張靜譯：《現代化的動力——一個比較史的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頁56、63；58。

⑦ 原文出自威爾遜在1919年寫給太太的一封信，參見 www.woodrowwilson.org/woodrow-wilson-quotes。